

商周时期东南地区社会发展模式初探

徐良高

关键词：商周时期 东南地区 经济模式 政治形态 社会发展模式

KEYWORDS: Shang and Zhou Periods Southeast China Economic Model Political Form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ABSTRACT: Southeast China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had its own unique economic models, political formations, and social complexity development modes. Coupl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i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decentralized, diverse reg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s and high-status eli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drove social complexity.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ritual-music culture and the system of rites,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strengthened mutu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outheast regions.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precious raw materials and luxury goods, they established economic ties. This continuous interaction progressively deepene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core and the southeastern periphery, lay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southeast region'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pluralistic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al entity.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考古发现展开深度阐释，探讨不同区域古代文化特征、社会面貌、发展道路与机制，理清其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其中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是一个代表性区域，值得专门讨论。

本文讨论的东南地区包括大别山南麓至江西地区以及长江以南的皖南、苏南、浙江和闽北地区，研究时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至吴越两国明确出现于历史舞台之前的春秋早期。从考古学文化来说，包括大路铺文化、吴城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土墩墓文化

等，流行几何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器是其突出特征。从文献记载来看，该区域除皖西南与文献中的淮夷、群舒关系密切外，整体上应属于百越文化的范围。

重点研究这一时段东南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我们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面貌的认识日益清晰，如上山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樊城堆文化、好川文化等等，良渚文化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文明^[1]。春秋中期以后，作为该区域文化代表的吴越两国出现于历史舞台上，传统文献如《春秋

作者：徐良高，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经》《左传》《国语》《史记》中有诸多吴越争雄和争霸中原的记载，尽管相关记载简单、粗疏并充满了历史的演绎与主观构建^[2]。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则提供了比较明确的证据，如木渎古城^[3]、阖闾城^[4]、宁镇与环太湖东周土墩墓^[5]、绍兴一带越国都城与越王陵^[6]，以及多件铸有与文献所记载吴王、越王名字对应铭文的青铜器等。唯商至春秋早期这一时段，东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及其与中原商周王朝的关系不清楚，需要通过考古发现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和多学科研究成果，展开深入研究与阐释。其次，考古发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该区域考古成果已经初步建立了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对于当时的手工业生产遗址、矿冶遗址、聚落结构与特征、聚落群分布及其与环境、矿产资源、交通的关系等方面研究，均积累了大量新材料，有了更多新认识。尤其是通过考古发现，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该地区与中原商周王朝的密切关系，而且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使我们认识到东南地区可能存在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政治形态。

一、聚落遗址所反映的经济模式

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生产和青铜采冶铸遗存^[7]是东南地区商周考古的突出现象，在东南地区的商周时期考古发现中，存在大量以手工业生产和青铜采冶铸等经济活动为突出特征的不同等级的聚落遗址。

浙江北部以德清县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是夏商周时期印纹硬陶、原始瓷窑址的主要分布区之一，集中分布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专业生产窑场。窑址集中分布于德清龙山和湖州青山两个片区^[8]。郑建明总结东苕溪流域窑址群特征如下：（1）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从夏代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诸时期；（2）窑址密集、生产规模大，从目前已掌握的材料看，已发现窑址近150处，占全国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总数的90%以上；（3）产品种类丰富，除生产日用的碗、盘、碟类器物外，还大量烧造象征身份与地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仿铜礼器和乐器，如鼎、卣、簋、豆、壶、壘、罐、甗、盘、盆、鉴、三足盘、镂孔瓶、提梁壶、提梁盃、匜、钵、镇和甬钟、句鑊、罍于、鼓座等；（4）产品质量高；（5）发现最早的龙窑，窑具形态各异，装烧工艺成熟；（6）独立窑区，自夏代开始，本地区即形成独立窑区而不依托于遗址，说明制瓷业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存在^[9]。

在东苕溪流域也存在与窑址同时的较大型聚落遗址，如昆山^[10]、下菰城^[11]等，不过，这些遗址的堆积都不太丰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中心性聚落遗址。这几处较大型聚落很可能因窑业生产而兴起，主要功能在于窑业生产的组织、管理与产品的交易、转运，正如郑建明所指出的，东苕溪流域存在不依托于遗址的独立窑区，大型聚落反而是因窑区制陶手工业经济而兴起。

闽北地区同样存在突出的印纹硬陶器和原始瓷生产中心，该地区商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一系列窑址，如武

夷山市兴田镇葫芦山窑址、浦城县猫耳山商代窑址群、泉州市永春苦寨坑窑址群、武夷山市竹林坑窑址等^[12]。其中，猫耳山聚落群划分为窑址、墓地、居址三个功能区，商代窑址群位于最核心地带，已发掘9座窑炉，产品以施黑衣的印纹硬陶为主，主要有罐、盆、釜、豆、盅等器形，另有少量原始瓷^[13]。在辽田尖山窑址发掘8座龙窑，苦寨坑窑址发掘9座龙窑，出土器物有尊、罐、钵、壶、纺轮等，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窑址距今3800—3400年，该窑址群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烧制原始瓷器的窑址^[1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窑址群的年代在早商、晚商之际^[15]或西周早期^[16]。据考古材料，在晋江流域的安溪、南安、晋江、惠安等地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苦寨坑窑址产品相同的原始瓷器，同时在闽江下游、九龙江下游的青铜时代遗址中也有该窑址群的产品发现^[17]。竹林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2座窑址及相关作坊遗址，产品主要以原始瓷豆为主，另有少量罐、尊等，时代为西周早中期。与竹林坑窑址隔溪相对的官庄村附近山头上，有四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窑址以及三处西周时期遗址，其中一处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大型墓葬^[18]。

西周至春秋前期的浙江衢州云溪土墩墓和皖南黄山市屯溪土墩墓出土的原始瓷器，如带粗弦纹壶、鼓腹矮圈足罐、双系筒形罐、敞口或盘口的折腹尊、盃、深腹孟等，具有高度一致性，有学者指出该组原始瓷器表现出相当“纯粹”的土著性，在黄山-天台山以南地区较为常见，不见或少见于周边地区^[19]。该组原始瓷器提示在皖南、浙西

可能存在另一处尚未被考古发现的原始瓷器专门化生产窑场。

杭州市余杭区跳头遗址则是一处长江下游商代晚期的青铜铸造聚落遗址，出土镞、斧石范和铜器、铅锭等铸铜遗存^[20]。

皖南、皖西南与江西地区的商周遗址无论大小，也同样多与陶瓷器生产、青铜采冶铸活动有关。

鹰潭角山遗址是另一处独立窑业生产中心，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包括高岭土矿区、作坊区、工棚区、窑炉区等，距今3500—3100年，是商代的一处专业化生产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窑场^[21]。其产品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22]、宜黄锅底山遗址上层遗存^[23]和福建光泽的池湖墓葬^[24]等都有发现，有三足盘、鬲、罐、尊、甗形器等，显示角山窑场的产品在很大区域内流通，是一处商品化生产的窑场。

吴城遗址平面近圆角方形，城内面积61.3万平方米，围绕一周宽约6.5、深约3.1米的城壕。从遗迹分布看，原始瓷、印纹硬陶器的生产和青铜冶铸无疑是该城的重要活动，宗教祭祀活动虽然也占据重要地位，但与制陶、青铜冶铸孰主孰次，尚难判断^[25]。九江市莽麦岭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000平方米范围内突出的是与青铜冶炼、铸造有关的遗存，如铜矿石、炉壁、炼渣、陶勺、坩埚等，出土陶器包括一批典型中原商文化早中期风格的绳纹鬲、豆、罐等以及地方特色陶器、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等^[26]。在江西地区的一般商周遗址中也多发现有与印纹硬陶生产和青铜冶铸相关的遗迹，如安义县长龙遗

址^[27]、德安市石灰山遗址^[28]等，还有与古代铜矿采冶直接相关的遗址，如瑞昌铜岭遗址^[29]。

皖南的铜陵师姑墩遗址虽然是一处夏商至春秋时期面积不大的普通遗址，但也存在青铜冶炼与铸造遗迹，特别是带刻纹的鼎类陶范证明该聚落还可铸造工艺复杂的容器^[30]。考古调查显示，该遗址所在的小盆地内几个同时期遗址中均有较多青铜冶铸现象，如夏家墩遗址、神墩遗址等。对铜陵及附近地区的全面调查发现的数十处墩形遗址面积多在一万平方米以内，周边多有河沟环绕。在这些遗址中，绝大多数均可在地表采集到炉渣，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早期。从地理分布看，这些墩形遗址都分布在凤凰山等矿区数十公里范围内，整个聚落群都与青铜冶铸有关。发掘者推测这些遗址的冶铜生产模式相似，或为民营，或为官控的特殊群体，遗址兼具生活与冶铸功能^[31]。

距离铜矿区较远的皖西南地区中小型遗址中也多见青铜冶铸遗迹，如合肥大雁墩遗址^[32]、庐江凤形遗址^[33]、庐江坝埂遗址^[34]、庐江丁家畈遗址^[35]等，枞阳一带也存在商周时期规模不等的青铜矿冶遗址^[36]。

大路铺文化是商周时期分布于鄂东南、皖西南和赣西北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存在于二里岗文化退出之后和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之前。考古发现该文化聚落遗址的突出特征是无大小，多与该地区的青铜采冶铸活动密切相关，如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37]、阳新大路铺遗址^[38]、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39]、阳新和尚埭遗址^[40]、大冶蟹子地遗

址^[41]、大冶香炉山遗址^[42]、武穴磨尔山遗址^[43]、浠水忠三湾遗址^[44]、浠水社屋山遗址^[45]等。近年在湖北咸宁赤壁发现的大湖咀遗址也应与东南地区铜、铅、锡等金属资源的控制、经营有关^[46]。从余家畈遗址发现2件兽面纹陶范、大路铺遗址发现青铜容器陶范^[47]的现象看，部分较高等级的聚落可以铸造青铜礼器。

据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等在幕阜山脉东北部山间盆地开展的考古调查，确认的60余处先秦矿冶遗址的年代集中于晚商至春秋中期，大致可分为沿白沙港、浮屠港、良荐河、赛桥湖等河湖水系分布的四个生产单元。这四个生产单元可能就近利用矿产资源生产不同的金属产品，并通过各自所处的水系向不同方向输出产品^[48]。

从以上遗址所表现的聚落特征可以看出，东南地区的聚落往往以特定手工业生产中心或资源开采为核心，经济活动与聚落功能密切相关。无论聚落大小和等级高低，都有原始瓷、印纹硬陶器，甚至青铜采冶铸活动，表现出某种民营主导社会生产的特征。较大型聚落多与较大型手工业生产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相关，不见中原大型城址中的高等级建筑、大规模祭祀遗存等政治中心特征，即使有一些城址，如葛城遗址、吴城遗址，不仅规模小，而且政治、礼仪中心的特性不突出，反而是经济、防卫特征更突出。

从考古遗存看，东南地区商周时期社会，权力对生产、经营的控制和对重要资源的垄断不明显，反而显示出某种因生产经营、资源开采和商品贸易等经济活动带来财富积累与社会地位提升

的现象，如大型墓葬往往出现在生产中心或交通枢纽附近，墓主人的财富、地位与手工业产品生产、资源开采和贸易活动相关。墓主人地位高低一般体现在墓葬规模和随葬原始瓷、印纹硬陶器和玉器等的多少上。从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器在东南地区的广泛存在和不同规模、等级的墓葬与遗址均可拥有的现象看，其主要是作为贵重物品和财富的标示，而不是具有等级化和垄断性的政治权力和身份地位象征物，看不到中原地区青铜礼器那样的权力对其生产与使用予以严格控制的相关特征。这些大墓虽也随葬青铜礼器与兵器，但青铜礼器更可能是作为来自中心地区的威望品与奢侈品，而不是政治权力与等级的象征品。因为如果作为政治权力与等级的象征，这些青铜礼器的使用就显得既不明确也不规范。大墓中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如衢州云溪高等级土墩墓基本不见青铜礼器。即使一些大墓中有来自中原商周王朝或仿自中原礼器的青铜器，使用也不规范，组合各异，看不出像中原地区商代以酒器觚、爵的多少和周代以鼎、簋的多少为标志的等级象征体系。从现有迹象看，这些大墓的主人可能因经济实力而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通过与商周王朝和周边区域的贸易来获得财富、权力与地位，并通过商周王朝赏赐或自铸青铜礼器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即他们是因富而贵。

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聚落遗址与资源和手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关系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即权力对资源和重要手工业生产的控制与垄断。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类威望品、兵器

和玉器等奢侈品均集中于不同等级的政治中心如都城和高等级聚落中，数量多少和品质高低也与聚落主人政治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密切相关，体现出“宗器不鬻”的垄断性。正如有学者指出，“二里头时期，铸造青铜礼器的可靠证据礼器陶范仅发现在二里头遗址。地区中心比如垣曲南关和夏县东下冯则只发现铸造青铜武器和工具的石范。这个模式在二里岗时代似乎继续存在，郑州是目前惟一发现礼器陶范的遗址”，“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青铜礼器的生产和分配很可能是由首都所垄断”^[49]。晚商与西周时期，青铜礼器的铸造也仅见于殷墟、周原、成周这样的都城遗址和台家寺遗址^[50]、孔头沟遗址^[51]、姚河塬遗址^[52]等高等级聚落中。

刘莉、陈星灿指出，“中国最早的国家，以核心地区的庞大城市中心支配富有重要自然资源的边缘地区为特征”，“二里头显然不仅是政治和礼仪的中心，它也应该是控制各种手工业生产的中心”，“许多第二等级的中心大概就是为了保证这些资源的开发和运输而形成的”^[53]。这些分析虽然体现了中原地区三代王朝作为政治中心的高等级聚落遗址与资源控制、重要手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关系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征收、汇聚资源，即所谓贡赋体系，并控制重要产品的手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其本质是政治、宗教权力左右经济活动而不是资源与重要产品的生产等经济活动导致权力阶层和聚落中心的出现。政治权力则来自于掌握军事武力和宗教祭祀权力，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政

治控制经济，权贵们不是“因富而贵”，而是“因贵而富”。究其原因，这与三代社会广泛存在的血缘组织、宗法制政治制度和祖先崇拜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我们对此曾经做过具体分析^[54]，在此不再赘述。

考察商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周原、丰镐遗址等的聚落布局，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政治形态与经济模式的表现，如规模巨大的都城遗址是统治区域内最高权力中心和财富汇聚之地，政治中心内的建筑、墓葬、礼器的等级，财富和奢侈品的多少，与其政治等级、宗法地位密切相关，主要建筑与政治权力、宗庙祭祀密切相关，手工业生产等经济活动基本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与掌控。城市等高等级聚落的主要功能不是作为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流的经济中心，而是政治中心，一个居于宗教祭祀中心和政治礼仪中心地位的“大邑”。“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流中心功能的城市直到战国时期才迅速发展起来”^[55]。

从对贵重的金属原料的拥有与控制情况来看，东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商周王朝也不相同，对比鲜明。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商代铅锭贮藏坑^[56]、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郑州二里岗遗址的锡块、周原遗址上康和召李村的饼形铜锭、叶家山曾国大墓M28的铜锭^[57]等均出土在商周王朝的都城和高等级大墓中，显示商周王朝王室与高等级贵族对金属资源等原材料的控制。与之不同，东南地区的金属原材料常常出现在等级并不很高的墓葬之中，如江苏金坛鳖墩土墩墓所出陶坛中的230块铜块^[58]、鳖墩附近的土窖

和溧水、丹阳、句容西庙等地土墩墓中出土的冰铜块等^[59]。这一现象正与该地区中小遗址常常也存在青铜冶铸遗存相呼应，显示东南地区民间可以拥有金属资源，开展青铜器冶铸生产，官方或高级贵族并没有对金属资源的垄断权，或者说不存在垄断金属资源和青铜器生产的超级权力。

二、区域聚落中心的兴起 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如前文所述，虽然中原地区中心聚落的兴起、迁移与资源的控制有关系，但并不是那么直接，且与重要资源地也存在较远的距离，反而政治考量是第一位的，资源掌控是通过政治、军事来实现的。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兴起与商人西进灭夏和控制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密切相关，商都东迁、洹北商城与殷墟的兴起与商中期的九世乱等政治事件关系密切，周原兴起与古公亶父迫于戎狄侵扰而南迁有关，建都丰镐与东进灭商相关，建都成周洛邑与天下之中观念、控制新占领的广大东方地区和殷顽民密切相关。与之相比，东南地区大型遗址和区域中心聚落的兴起、高等级人群的出现与金属资源采冶、手工业生产或交通、贸易枢纽等存在直接关联，可以说经济活动主导了中心性聚落的兴起和高等级人群的出现，是东南地区社会复杂化的主要推动力。

首先，一些大型遗址和区域中心聚落作为生产中心而兴起。

如前所述，昆山城址、下菰城城址的出现与东苕溪原始瓷、印纹硬陶器制造业生产、管理与运销相关；鹰潭角山

遗址、闽北浦城县猫耳山遗址、永春苦寨坑遗址、武夷山竹林坑遗址等均以陶瓷器生产为中心；大路铺文化的诸多重要遗址与铜、铅、锡等金属资源的采冶和运输相关，如铜绿山遗址、大路铺遗址、陈保畷遗址、大湖咀遗址、瑞昌铜岭遗址等；南陵牯牛山城址^[60]周边是皖南铜矿带，往西20公里是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的中心地带，城址扼漳河、青弋江水上交通、运输之要冲，控制着附近铜矿的开发与运输^[61]。瓯海杨府山土墩墓^[62]和黄岩小人尖土墩墓^[63]所处之地临江毗海，享有鱼盐之利^[64]。

其次，一些大型遗址和区域中心聚落因地处流通枢纽而兴起。

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既存在着对外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物品交流网络，即所谓的“金道锡行”，自然也存在内部的交流通道系统。

关于与中原地区的物品流通网络“金道锡行”，很多学者都有论述^[65]。刘莉和陈星灿梳理出早期中国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之间资源流动的东中西三条路线^[66]。此外，结合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发现^[67]、“鼬侯鼎”铭文“获巢”^[68]、“柞伯鼎”铭文^[69]、《尚书序》“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70]等的记载，可知商周时期还存在一条由汝河等淮河水系沿大别山东麓至江淮之间的“巢”，跨长江到东南地区的交通线。盘龙城遗址、大湖咀遗址、莽麦岭遗址、蕲春毛家嘴遗址^[71]、庐江丁家畷遗址、枞阳汤家墩遗址^[72]等当是此“金道锡行”路线上的重要遗址，它们应是由此而兴。

关于东南地区内部的物品流通问

题，我们注意到东南地区内部原始瓷、印纹硬陶器存在广泛的一致性^[73]。杨楠指出以B类原始瓷器中的I组因素为标志，主要包括带矮圈足的豆、碗、盂、盘、盅式碗、钵式碗、盅（杯）等，由黄山-天台山以南地区、太湖-杭州湾地区及宁镇地区逐渐向周边扩展，最后几乎遍布整个南方地区^[74]。这种一致性显示东南地区内部存在广泛的商品交易和物品流通，由此可见必然存在内部的某种通道网络。

对外的“金道锡行”交通网与东南地区内部通道网络连接起来，构成更大的物资流通网，许多处于该网络枢纽上的聚落由此而兴，一些人群也由此而富。从地理位置看，莽麦岭遗址所在的九江地处长江与赣江交汇处，号称“三江之口，七省通衢”，自古是东西南北四方交通的交汇点。樟树吴城遗址地处鄱阳湖-赣江流域中心地带，清江盆地核心区，在赣江上下游交叉点和通往抚河流域、闽北和岭南的交通枢纽之上。莽麦岭遗址、吴城遗址不仅是陶瓷器、青铜器的生产基地，也应是物资流通枢纽，成为重要聚落与它们所担负的金属资源和原始瓷、印纹硬陶器的转运、交换枢纽角色密切相关，这一点从这两处遗址的出土遗物既有本地文化因素、也有商文化因素和周边文化因素即可看出。宁镇地区自古即为南北交通要道和北方文化南下与东南文化北上的桥头堡，宁镇地区土墩墓群^[75]和葛城城址^[76]的出现与此相关。皖南的繁昌一带跨长江即达大别山东南麓，再往西可达长江中游，往北可达淮河流域，该地分布着大量土墩墓，其中一些土墩墓等级很

高^[77]。屯溪土墩墓群^[78]位于休屯盆地，地处横江、率水与新安江汇合处，是新安江上游山区的一大商业中心地。衢州云溪土墩墓群^[79]所处的金衢盆地自古是赣江流域到浙江、皖南到闽北的重要通道。以光泽池湖马岭墓地、杨山遗址^[80]为代表的聚落群位于长江中游经江西抚河流域进入闽江流域的交通枢纽位置。管九土墩墓群^[81]所在的浦城则是福建的“北大门”，位于福建省最北端，自古为中原入闽第一关。大路铺文化除了直接开发自己控制区的金属资源外，还应在沿长江路线的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中转枢纽作用，商周时期的“金道锡行”途经此地，一些重要的大路铺文化聚落，如大湖咀遗址的兴起当与此有关。

三、中原中心对东南地区的影响

理解商周时期东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除了以比较的眼光来分析其与中原地区的差异，还要以联系的眼光来分析其与中原地区的关联及商周王朝对其发展的影响，毕竟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学术界一般以中心和周边的关系来看待中原商周王朝与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原商周王朝如何影响东南地区，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可分为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所谓‘中心地区’是指利用边缘地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以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经济体中贸易和金

融市场运转的地区。中心地区享有先进的工农业以及发达的商业和金融业，其显著特征就是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所谓‘边缘地区’是指依靠粗放耕作和强制劳动从事经济作物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并向中心地区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市场的地区。边缘地区是中心国家竞相占领和控制的对象，其关键性特征就是‘缺乏强大的国家机器’”^[82]。经过史学家修正与补充的世界体系模型认为区域性威望品交换网络对古代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包含承载特定政治经济内涵的威望品和奢侈品交换的世界体系模型存在理论缺陷^[83]。

商代早期商王朝通过以盘龙城遗址为中心的据点对东南地区进行直接的控制^[84]，瑞昌铜岭铜矿可能由商人直接经营^[85]，商代中期以后的商王朝对东南地区采取间接的控制与经营方式^[86]。西周王朝与东南地区也保持某种朝贡关系，如文献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87]。周王朝虽然封建了曾国^[88]，以及通过黄陂鲁台山^[89]等战略据点对东南地区进行监控、联系，但并未进行直接统治，吴越两国的分封故事更可能是一种政治需要的历史建构^[90]。我们认为商周王朝均通过贡赋、联盟、战争、贸易等手段建立与东南地区的联系，“金道锡行”的存在证明了这种联系的存在，春秋中晚期吴越两国与晋楚齐鲁等国的密切关系也显示这种联系有其历史基础^[91]。

依据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中心的商周王朝向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输出以礼器为代表的威望品，考古发现显示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中已出现二里头文化的特殊器物陶觚、觶。商文化风格青铜

器大量出现于东南地区，如皖南、江浙地区出土的青铜器^[92]、江西吴城文化中的商式青铜器，尤其是新干大洋洲墓葬出土的大量商式青铜器和玉器^[93]。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土墩墓中更是大量出现中原周文化风格的青铜礼器和仿自周文化但装饰地方性特点纹饰的青铜礼器^[94]。我们认为东南地区商周时期已初步融入“青铜礼器文化圈”之中^[95]。通过对这些礼器的接受，东南地区也渐渐认同和接受这些礼器所象征的礼乐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制度和祖先崇拜信仰等文化大传统，使该地区的文化与人群逐步融入华夏文化圈之中，为东周时期吴越文化华夏化奠定了基础。

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则向中心的商周王朝输出铜、铅、锡等金属资源^[96]和独具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如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马桥文化鸭形壶、象鼻盃^[97]，商周都城和大墓中出土的大量来自东南地区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98]即是证明。此外，可能还有象牙、龟甲、翠羽、犀角和香木等东南特产。

中原中心与东南边缘之间的互动，一方面限制了东南地区统一政权的出现，另一方面推动了东南地区多元政治经济中心的出现。首先，商周王朝不会允许东南地方出现一个可能与之对抗的统一权力中心。其次，东南地区与商周王朝的不同贸易路线自然形成不同的枢纽中心，不同的手工业产品生产中心和金属采冶中心也会产生不同的区域经济、政治中心，这些中心虽然均服从或服务于中原商周政权，但彼此之间却是相互独立与竞争的关系。另外，东南地

区多元的历史文化传统、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以及缺乏北方那样广泛存在的血缘组织^[99]，也有助于多元政治中心的形成。

考古发现显示，随着商王朝直接控制的消失，各地地方土著文化兴起，如鄂东南与赣西北出现大路铺文化；清江盆地的吴城遗址商文化因素比例明显下降，直至被土著文化因素突出的牛城遗址所取代^[100]；东部早期有湖熟文化与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两周时期出现土墩墓文化。由当地人群经营的各地铜矿^[101]促使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日益扩散，原来的经济中心转变为经济与政治中心并重，各地高等级墓葬显示当地土著上层贵族出现并相互独立并存，多区域政治体和政治中心出现^[102]。这一现象与传统文献中有关东南地区族群众多、政权多元的记载相对应，如《吕氏春秋》对越族诸部有“百越”之称，《周礼·职方氏》对闽越有“七闽”之称^[103]。这种多元、分散的经济政治中心现象也符合世界体系理论中边缘地区政权弱勢的原理。

四、结 语

通过梳理东南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分析其聚落特点，比较其与中原地区商周聚落形态的异同，结合对作为中心的中原商周王朝与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之间关系及其影响的分析，我们发现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有其独特的经济模式、政治形态与社会复杂化发展模式，即民营手工业生产与金属采冶发达，市场化经济推动区域性生产中心和交流中心的出现，加之商周王朝的影

响，形成分散、多元的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及高等级人群，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复杂化进程^[104]。无论是早期的直接控制还是后来的间接联系，作为中心的商周王朝通过输出自己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及以威望品——礼器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与礼制，强化了彼此的文化与制度认同；作为边缘的东南地区则向中原商周王朝输出铜、铅、锡等金属矿产资源，以原始瓷、印纹硬陶器为代表的独特手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地域性特产，彼此构成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两者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原中心与东南边缘之间的整合，为东南地区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体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

苏秉琦^[105]、严文明^[106]、张光直^[107]、李伯谦^[108]诸先生都论证过中国早期文化是多元的，不同地区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道路。考古发现与本文讨论使我们认识到商周时期的东南地区同样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与发展模式。如果我们分析北方地带、云贵高原^[109]、四川盆地、岭南等地区的考古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古代文化面貌、社会复杂化过程与机制，同样各有特色，我们只有将它们分别系统梳理出来，阐释清楚，才能真正理清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其演进机制，讲清楚各地古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附记：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项目编号2025CCXZ007）的资助。

注 释

[1] 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

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 [2] 徐良高：《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考古》2020年第9期。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考古》2011年第7期。
- [4] 李鉴昭：《江苏无锡县古阖闾城的调查》，《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 [5] a.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b.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c.苏州市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吴越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 [6] 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印山越王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绍兴越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 [7] 有学者称之为“长江中下游青铜冶金区”，参见崔春鹏等：《安徽安庆地区早期采矿与冶金遗址考察研究》，《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21年第1期。
-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东苕溪流域夏商时期原始瓷窑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
- [9] 郑建明：《夏商原始瓷略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46—50页。
- [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湖州昆山遗址2014—2015年考古发掘及周边调查简报》，《东南文化》2022年第3期。
- [11] a.劳伯敏：《从下菰城的兴衰看湖州治址的变迁》，《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b.陈元甫：《湖州下菰城的初步勘探与探索》，上海博物馆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20—431页。
- [12] 林蔚等：《中国最早的龙窑、原始瓷器在何

- 处?》，《福建日报》2022年6月29日，第3版。
- [13] a.福建博物院：《浦城仙阳商周窑址发掘的初步收获》，《福建文博》2006年第1期。
b.福建博物院、浦城县博物馆：《浦城县猫耳山聚落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福建文博》2019年第1期。
- [14] a.福建博物院、泉州市博物馆：《德化县辽田尖山原始瓷窑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6年第1期。
b.羊泽林：《福建泉州辽田尖山、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大众考古》2016年第11期。
- [15] 付琳：《从虎林山墓地出土陶尊看苦寨坑窑址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6—63页。
- [16] 郑建明：《21世纪以来的原始瓷窑址考古新发现》，《文物天地》2018年第7期。
- [17] a.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队：《福建晋江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b.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闽江下游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
c.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编：《虎林山遗址——福建漳州商周遗址发掘报告之一》，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
d.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鸟仑尾与狗头山——福建省商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 [18] a.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市博物馆：《武夷山市竹林坑一号原始瓷窑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12年第3期。
b.福建博物院、武夷山市博物馆、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市竹林坑一号原始青瓷窑址2014年度考古发掘收获》，《福建文博》2015年第1期。
- [19] 杨楠：《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区域特征》，《文物》2000年第3期。
- [20] a.林森、杨金东：《杭州余杭跳头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初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系、厦门大学中华民族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五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82—291页。
b.杨冬宜、林森、吴晓桐：《浙江余杭跳头遗址出土商周铜器和土壤沉积物的铅同位素分析》，《南方文物》2025年第1期。
- [2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鹰潭市博物馆：《角山窑址——1983—2007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22] 孙卓、彭苇苇、苏昕：《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生产背景》，《南方文物》2024年第3期。
- [23] 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宜黄县文物管理所：《江西宜黄县锅底山遗址2017年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4年第1期。
b.严振洪、田庄、冯锋：《锅底山遗址文化性质初步分析》，《南方文物》2024年第1期。
- [24] 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 [2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 [26] 胡晓军：《江西莽麦岭商代遗址考古获重大进展》，《光明日报》2014年6月9日，第9版。
- [2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安义县长龙西周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4年第6期。
- [28]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试掘》，《东南文化》1989年增刊。
- [29] 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遗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b.刘诗中、卢本珊：《瑞昌市铜岭铜矿遗址发掘报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昌博物馆主编：《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
c.卢本珊、刘诗中：《铜岭商周铜矿开采技术初步研究》，《文物》1993年第7期。

- d.彭适凡、刘诗中：《关于瑞昌商周铜矿遗存与古扬越人》，《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 [3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6期。
- [3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安徽铜陵夏家墩、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
- [32]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合肥大雁墩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2年第3期。
- [33] 姬美娇、王峰：《安徽庐江凤形遗址发现大型西周圆形房址》，《中国文物报》2020年1月17日，第8版。
- [34] 该遗址的情况未见详细报道，参见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庐江丁家畈遗址西周墓葬简报》，《江汉考古》2023年第6期。
- [35] 安徽省文物局主编，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庐江丁家畈遗址·槐树墩、月亮墩、东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 [36] 王艳杰、魏国锋、张爱冰：《庐枞地区与商周时期“金道锡行”关系试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4期。
- [37] a.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期。
b.黄石市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c.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与周围遗址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 [38] 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遗址东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 [39] 港下古铜矿遗址发掘小组：《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 [40] a.咸宁地区博物馆、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县和尚埡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b.田桂萍、曾科：《阳新县和尚埡两周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48页。
-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0年第4期。
- [4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大冶市香炉山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
- [4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穴市博物馆：《黄冈武穴磨尔山西周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68页。
- [4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浠水县博物馆：《湖北浠水县忠三湾遗址2010年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1年增刊。
- [4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浠水县博物馆：《湖北浠水县社屋山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增刊。
- [4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壁市博物馆：《湖北赤壁大湖咀遗址2022年度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23年第1期。
- [4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601、711页。
- [48] 海冰、陈丽新、汤琪琪：《2023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湖北日报》2024年1月21日，第4版。
- [49]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1—134页。
- [50]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6期。
- [5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岐山孔头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 [52]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彭阳县姚河塬遗址铸铜作坊区2017—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0期。
- [53] 同[49]。
- [54] 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9—342页。
- [55] 徐良高:《宗庙与祭祀:夏商周都城的突出特征》,上海博物馆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4—316页。
-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0期。
- [57] 参见陈建立:《从铸铜遗址铜锡铅原料的发现看商周青铜铸造业的中原与边疆》,《中国文物报》2018年9月21日,第6版。
- [58] 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鳖墩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3期。
- [59] 参见徐永年:《对吴国的称量货币——青铜块的探讨》,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第77—79页。
- [60] 宫希成、杨则东:《安徽省南陵县千峰山一带土墩墓及石铺塘西古城遗址遥感调查》,《光电子技术与信息》1998年第5期。
- [61] 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
b.刘平生:《安徽南陵大工山古代铜矿遗址发现和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
c.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南陵县古铜矿采冶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2002年第2期。
d.郁永彬等:《皖南地区早期冶铜技术研究的新收获》,《考古》2015年第5期。
- [6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瓯海区文博会:《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
- [6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00—205页。
- [64] 同[2]。
- [65] a.陈公柔:《曾伯黍簠铭中的“金道锡行”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
b.易德生:《周代南方的“金道锡行”试析——兼论青铜原料集散中心“繁汤”的形成》,《社会科学》(上海)2018年第1期。
- [66] 同[49]。
- [6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肥西县文物管理所:《安徽肥西县三官庙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11期。
- [6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考古队:《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9期。
- [69] 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
- [70] 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卅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597页。
- [71]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b.湖北黄冈市博物馆、湖北蕲春县博物馆:《湖北蕲春达城新屋湾西周铜器窖藏》,《文物》1997年第12期。
c.牛世山:《湖北东北部晚商文化的新认识——从蕲春毛家咀遗址和新屋湾青铜器谈起》,《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
- [72] a.安徽大学历史系、枞阳县文物管理所编:《枞阳商周青铜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
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县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 [73] 同[2]。
- [74] 同[19]。
- [75] a.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b.尹焕章:《仪征破山口探掘出土铜器记

- 略》，《文物》1960年第4期。
- c.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
- d.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磨盘墩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1期。
- e.刘兴、吴大林：《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年第4期。
- [76] 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阳市文化局：《江苏丹阳葛城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
- [77] a.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繁昌县文化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 b.杨旭霞：《安徽省繁昌县平铺土墩墓》，《考古》1990年第2期。
- c.张爱冰、陆勤毅：《繁昌汤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10年第12期。
- [78] a.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 b.殷涤非：《安徽屯溪周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90年第3期。
- c.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 [79] a.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考古》1984年第7期。
- 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1979—2019）》，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232页。
- [80] a.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
- b.同[24]。
- [81]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年第7期。
- [82] a.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b.舒建中：《沃勒斯坦“中心-边缘”论述评》，《学术论坛》2002年第6期。
- [83] 温成浩：《世界体系理论对考古学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14日，第9版。
- [84] 施劲松：《盘龙城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考古》2016年第8期。
- [85] 黎海超：《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时期采矿遗址研究》，《考古》2016年第10期。
- [86] a.豆海锋：《长江中游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及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考古》2014年第2期。
- b.孙卓：《中商时期南方地区文化格局的转变》，《江汉考古》2023年第6期。
- [87] 王国维：《今本竹书记年疏证》，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文竹书记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 [88]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 [89] 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 [90] 同[2]。
- [91] 参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445—1476、1739—1756页。
- [92] a.张国茂：《安徽铜陵地区先秦青铜文化简论》，《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 b.南京市文化局、南京市文物局主编：《南京文物精华·器物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 c.浙江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物》1986年第2期。
- [9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 [94] 杨楠：《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遗存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 [95] 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

- 227—236页。
- [96] 彭子成等:《赣鄂皖诸地古代矿料去向的初步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
- [97] 罗汝鹏:《从“象鼻盃”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贡赋模式》,《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 [98] a.黎海超:《金道瓷行——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7—128页。
b.杜丽群、王欢、黄一哲:《西周王朝原始瓷器的流通与分配——基于墓葬出土品的回归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4年第1期。
- [99] 吴桐:《试论中国东部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79—113页。
- [100] 黄水根、周广明、朱福生:《吴城与牛城文化分析》,王宇信、宋镇豪、徐义华主编:《夏商周文明研究·八——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中国福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23—528页。
- [101] a.张正明、刘玉堂:《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兼论上古产铜中心的变迁》,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72页。
b.同[85]。
- [102] 同[2]。
- [103] 参见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14页。
- [104] 有学者提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化的主要模式就是商品经济模式,参见何弩:《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商品经济模式新探》,《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
- [105]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 [106]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 [107]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55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 [108]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 [109] 徐良高:《从比较史学视角认识石寨山文化的社会特征与政治形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编著:《李家山五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第1—10页。

(责任编辑 杨 晖)

○信息与交流

《邳州河湾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简介

《邳州河湾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由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市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本书为大16开精装本,有正文229页,彩色图版136页,定价420元。

河湾墓地位于江苏省邳州市运河街道河湾社区。2015年3—11月,南京博物院对邳州河湾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汉代墓葬211座,其中包括土

坑墓3座、砖室墓208座,以及少量沟、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陶器、铜器、铜镜、钱币等遗物。该书对河湾墓地的年代、性质、结构、归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墓地属于一处东汉时期经过严格规划的公共墓地。上述发现为探讨东汉平民阶层的葬俗与葬制、下邳国的历史文化等问题,提供了较重要的资料。

(露 箬)